循名考实 慎始敬终

■ 何学森

各位毕业生完成了学业，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行满功成，实至名归，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说到了“实至名归”这个词，我想要特别强调一下“名”与“实”。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注重“名”“实”关系。在大家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名”很重要，“实”也非常重要。毕业了，我们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儿呢？硕士、博士！具体地说，书法硕士、书法博士。更具体说，是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培养的书法硕士、书法博士。这样的名头、招牌，我们应该想明白、弄清楚。

首先，书法专业是什么，它在整个的学科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国家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一共修订了四次，最近两次是在1997年和2011年。长期以来，高校书法硕士博士招生往往都是挂靠于其他一些专业。在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里面，“美学”“美术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等这样一些书法挂靠的学科专业，都是二级学科。那样的情况下，书法可能享有的最高地位也只是一个三级学科。

2011年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学科门类从过去的十二个变成了十三个，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一个学科门类了。于是，“美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如果延续过去的一般看法，书法似乎也就升级为美术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了。

一直以来，我们有个共识：书法非常了不起，它是“技”“道”并重的。我们书法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很好的实践创作能力，那就是空头理论家。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丰富的思辨知识，书法与蜡染、剪纸、年画等民间工艺就没有本质区别，就没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地位，也就没有必要培养“书法博士”了。

现在每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各个高校书法专业都在秀成就、秀骄傲。太多太多的高校书法专业，百舸争流，千岩竞秀，万类霜天竞自由。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一种压力，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毕业以后能够有强劲的竞争力，能够挺着腰杆儿骄傲地自报家门，我们应该如何坚持不懈地打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这块金字招牌呢？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铸造并且呵护好这个金字招牌，需要近乎残酷的含辛茹苦、坚韧不拔。如果老师失职，如果娇惯学生，那会有损我们的这块招牌，就会损害到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荣誉和利益。在你们在校学习的三年当中，我们对你们比较严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希望同学们能够体谅老师们这一番“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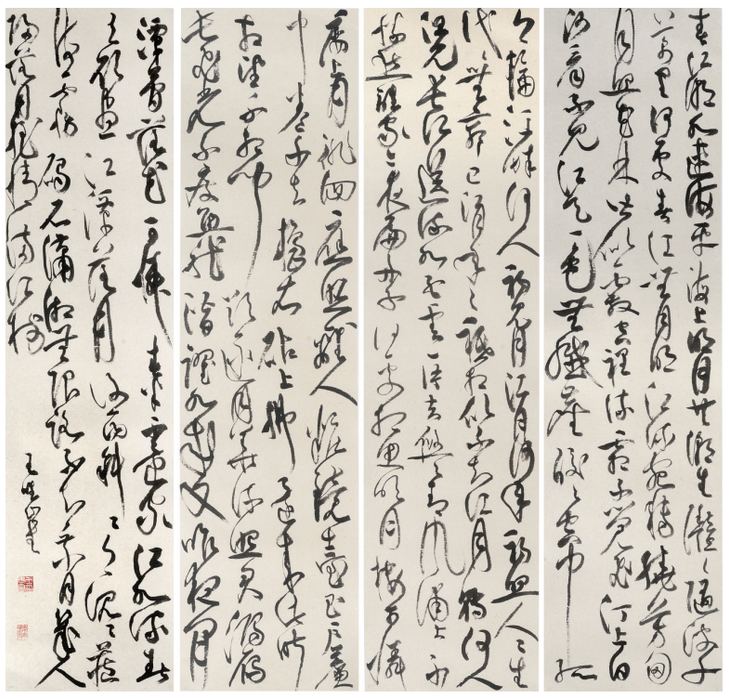
毕业的同学就要踏上新的征程，今后的道路，会有鲜花、有彩虹，也会有荆棘、有坎坷。不管怎样，请你们记住，书法是一个高尚脱俗的专业，书法人是高尚脱俗的人。人生会有许多不如意，社会总有很多纷纷扰扰。我们怎么去尽努力面对呢？大家应该记住欧阳中石先生说的六个字：“打圆心”“知进退”。

怎么“打圆心”呢？首先要想清楚，什么是我们的圆心——有阶段性的圆心，还有贯穿始终的圆心。然后，我们要找到圆心，找到我们与圆心之间的位置关系，这其实也就是找到自己、认识自己。圆心不一定就在我们的前面，也可能在我们背后，所以打圆心之前必须找到圆心、直面圆心。最后一步才是打圆心。我们端起弓箭，平射的把握最大，所以要调整好自己的最佳位置，这就需要“知进退”了。知道圆心在哪里，按照打圆心的要求，审时度势，进退有据。并非每一次进退都符合理想，有时候需要以退为进。但是最充分地运用了当时客观条件的“退”的行为，实际上还是在践履“进”的精神的，这就是“知进退”了。

各位同学，关于书法专业学科位置的斟酌，硕士、博士学衔的颁授，以及关于书法院名称的考虑，这些都属于“名”的范畴。而“名”的确立，是为了体现对于“实”——也就是修养和能力的追求。我们要循名责实，名归实至，而不能名不符实，缘名失实，言过其实。大概可以这样说，我们追求的、珍惜的“名”，其实也就昭示了我们的“圆心”。我们不断努力地充实提高自己，让自己名实相称、名副其实，这就是在“打圆心”。

（本文根据何学森在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整理）

书林新秀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四条屏　王唯山

龙虫并雕

——王唯山书法小议

■ 颜子茗

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晚年为他的一本文集题了一个含意颇深的书名——《龙虫并雕斋文集》。他在书中对于自己的斋号作了一番解释：“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一般小文章、小意思。龙虫并雕，即两样都干。”

龙虫并雕——我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王唯山的治学与游艺也同样贴切，不过相较于王力先生专指大文章与小文章，用在王唯山这里则专指大学问和小学问，从宏观上看，文史哲乃其“雕龙”之大计，书法则是其“雕虫”之小技。

我与唯山兄是本科时候的同窗，我们的专业名叫书法篆刻，按理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合理化”愿景就是能成为一名书法家，然而这个愿景相较于唯山兄的抱负来说还是太小了，他那时俨然是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来要求自己的。无论东方传统的儒释道，还是西方艺术理论，他都真心诚意读了很多，不少东西他现在谈吐间也能信手拈来。不过，唯山兄并非不愿成为一名书法家，而是不愿只成为一名书法家，他和黄道周一样，视书法为第七第八等事业，但却又经营得无比细致。我们同学时，在我还在懵懂的“以气运字”时，他就已经在技法的研究上面有一定深度了。

我们一般人对于黄道周和傅青主的认识首先都是他们的书法，如果再有兴趣去研究才会发现他们都是经学、理学大家，是继往圣绝学之贤士大夫。毕竟感官之获取比理性之接受是要容易很多的，所以，我们对于他们书法的兴趣是多过于学问的；但当我们研究黄、傅二人的书法，仅仅当作纯粹书法家之作品来分析、解构似乎又是难得要旨的，且对于诸如傅青主草书中的那种缠绵险怪也会难以通融，这便需要从他们之人格气质上去探究，而决定其人格气质者正是其学问，因此对于感官获取之高要求又必待于理性之升华。可见，书法虽是“第七第八等事业”，却又实在是“第一第二等事业”之体现。唯山兄于学于艺的态度和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我认为对此类作者的书法作品，欣赏和评价都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准备，因为其每一个细节或许都能传递出一种脱胎于某种学问的意象。可能有的人认为我故弄玄虚了，我承认，因为我认为妙处就在玄和虚。唯山兄目前的社会名片还只是一个书法家，他也和光同尘一般呆在这个群体里面，但他和目前这个群体的差异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很珍惜这种差异，即便是自己的“雕虫小技”也要显得倔强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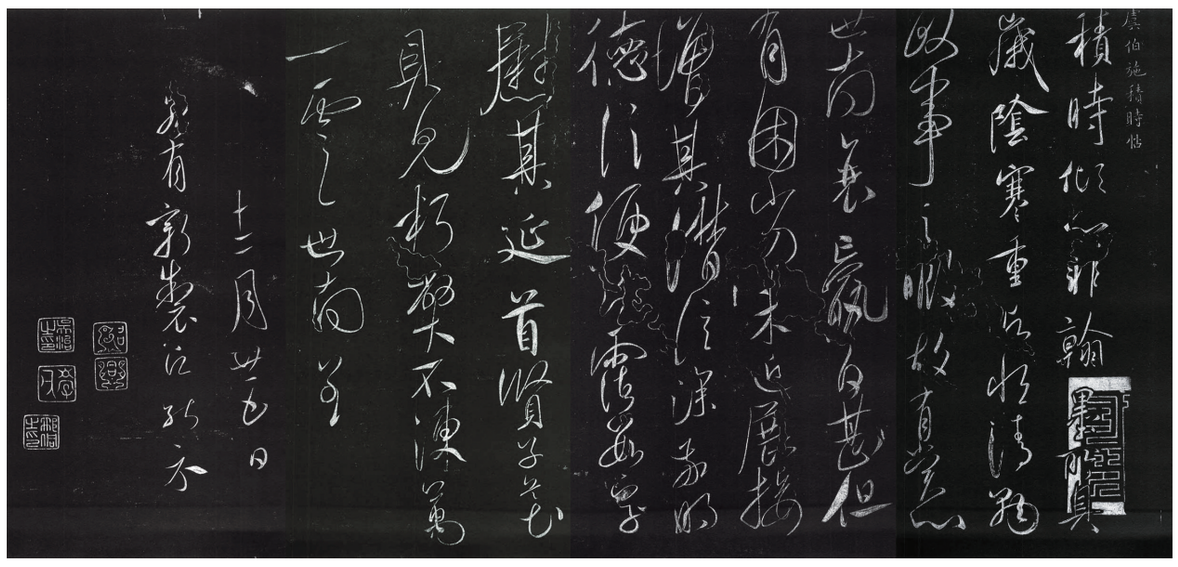
咀嚼书法

■ 吴书华

艺苑卮言

书法作为艺术，是“技”与“道”的共同体，是“技术”和“文化”的“双手合舞”。脱离了技术，便成不了艺术；技术低而下之，也成不了“高而上”的艺术。另外，脱离了文化蕴含的“道”，其技术也便没有了灵魂，成了空壳或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鉴赏、流传的意义。文化人只有在掌握了“高而上”的技术或功夫之后，才可以化身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人，书乃可贵。而那些具有了一定的技术甚或其技术相当娴熟、高超的人，也只有在文化的滋养下，在“道”上得以提升和突破，才有可能到达艺术的高峰。

书法中的汉字，都各有一张面孔，这张面孔可以有真、草、隶、篆的不同，也可以有欧、虞、颜、柳或者苏、黄、米、蔡的差别，它们似乎可以有说有笑，当然也总会有美有丑。因此，同一文字内容的书法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面孔，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时空里书写同样文字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面孔不一的作品。一幅字的面孔为何有喜、怒、哀、乐，又为何呈现出张、弛、虚、实之气象，这是因于自然、因于“决机”、因于“审势”，瞬息万变，无可揣度。其实也正因其变化之无穷，才尽显其烂漫风采和倜傥风流。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变化、怎么潇洒、怎么奔放，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必须可以识、可以读、可以辨。只有可识、可读、可辨，一幅字或者说一件作品，才可以跨越时空，将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意趣传递给社会、传递给未来。



《积时帖》拓本　唐　虞世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书法，简易而抽象。它有两种秉性，第一是实用性（即功用性），这是它产生的动力源泉，若没有实用性，很难想象这世上会出现书法这种独特的艺术。第二是艺术性（即审美性），它是用来审美愉悦的，特别是在当代其审美性能尤为凸显，不只是意趣审美，更令人震撼的是其意境审美的强化。但是书法之美又不同于其他艺术之美，它虽平实、简易、抽象甚至模糊，但却表意功能显著，这个功能是由文字本身携带的，所以书法在“艺术美”上还有“形韵之美”和“意韵之美”的双重作用，它是表意的实用性和形象、意境的审美性的统一体。

虽然今天人们大都是为了追求艺术而创作书法，表面看来似乎艺术性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但是它仍然具有实用性，仍然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体，它的实用性就是把汉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信息传递给不同时空的收藏者、鉴赏者。书法只要有文字或文字符号存在，就会有思想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就会有实用性。比如春联和匾额，谁能说它们只具艺术性而没有实用性呢？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凡是破坏或脱离了文字及文字符号的笔墨游戏，那不是书法。

书法不只简易而抽象、平实而玄妙，而且精凝而模糊。有时高下确实难以区分，好坏确实难以辨认，但只要用心，高低好坏总是可以区分和辨认的。书法，这一门槛甚低而又入门甚难的艺术，人人可以为之，又人人难以为之。小到三岁娃娃，大到百龄老叟，谁都可以侍弄一下、游戏一下，玩味其涂鸦之趣。耍一耍、乐一乐，本无可厚非，但要真正写出高格调、高品位、高境界的作品来，是非等闲之辈，更非游戏和玩乐所能企及的。

砚边随笔

一场说走就走的寻访

■ 傅强

访碑寻古是一件令人快意的雅事：在留恋人文、山川景色的同时，来寻访古人的踪迹，进而体验古人行事的方法和心路历程。这在今天看来，更像是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只不过这是根植在粗略计划基础上的，带有某种特定文化气息的行走。今时，很多既往访碑寻古的佳话仍在我们中间传颂，这些传颂看似更倾向于向人们传达一种谋求学问的方式，实则是在表述一种人们对待社会、自然和本身相协相容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随着获取知识、出行方式的进步，“碑”之“寻访”变得容易多了。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既往相对狭窄局域内的“访碑寻古”的访学方式，在今人的行事观念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在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获取文化的方式上，已经从根本上扩容了“访碑”的访学方式。大众普及的旅行方式，从更宽泛的角度向我们阐释着这种从行为角度上的扩容。也从一种“放松”的状态中，让“访”在途中的大众能够更加便利地体验和感受生活的不同含义。“访”须有所持重，即如古人之“访”，或为山川立传而“访”，或为发扬人文精神而“访”，或为感念旧怀而“访”，或起于一时之兴而“访”等，其“访”有所持重，所“学”优宜。“访”亦无须有所持重，从心而为，领略自然，若然偶遇或有所得，如遇一花一木，便可叹其开落荣枯，如逢风云忽变，也可领略天地玄机，如无有所遇，也可在优游中荡涤心绪等等，其“访”无所持重，然所“学”亦有所宜。以“访”为用，以“学”为体，两者互参而扩容，如此进则兴事，退可修福。“访”“学”之间一念之牵，走出去是关键，只要能够走出去，就有可能获得新“学”。哪怕是偶遇一片旧不曾见的树叶，也会增加你对叶子的别样认知。如此看来，“访”“学”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虽然，古今之转，时空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追求美好、向往美好的目的还是如此坚定。人们对于周遭诸物的探寻动机，是萌发于人性骨子里的对于新知的渴求之念。如此，岂止于“寻碑访古”，人类的很多行为皆是立于需求基础上的对于自然的把握和认知。对于自然认知、把握程度决定着人类对于美好的感念程度，而感念的生成需要有建立属于个体特色的体验心路，“访碑寻古”亦是开拓心路的一种方式。

“访碑寻古”古人做得很有特色，留下的一段段佳话让我们至今念念不忘，但更为重要的是，留给他们自己的可能就是大“道”于心的人生感悟。管子曾讲：“道在天为日，道在人为心”。“心”在则“道”在，只不过对于“道”的感知，在于“心”是否能够“会”之，若不可“会”，则“道”对于你而言则是一种“隐遁”。可见，理解了“道”，就理解了“心”；理解了“心”，就理解了“生活”；理解了“生活”，就理解了“访碑寻古”。同样，理解了“访碑寻古”，就理解了“生活”；理解了“生活”，就理解了“心”；理解了“心”，就理解了“道”。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来稿选登

詹进喜的书法追求

■ 刘广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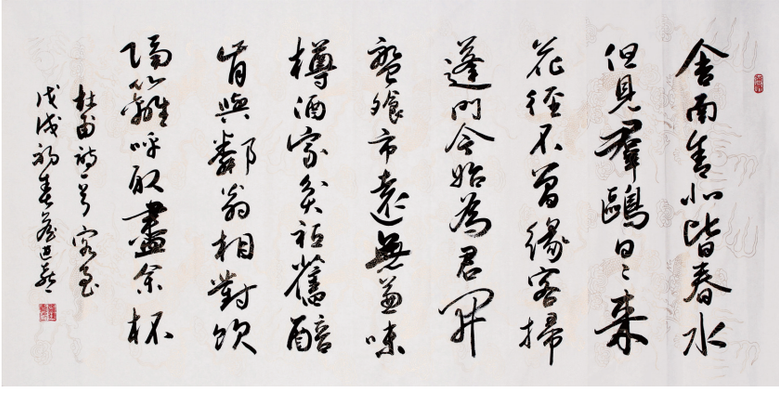
2010年与詹进喜相识在张宝瑞先生一个捐赠仪式上，我见到他用的印，形神俱佳，有刀斧之功。就问起这个人，没想到还是个年轻人，后来他刻一方印送给我，我非常喜欢这方印，刀功一流，便与我结下忘年之交。

他的书法字形硬朗、骨力坚挺。笔法和字法追求书法的美学，临帖之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从章法看十分严谨，这因他从小深受雕刻的影响。书法和篆刻是相通的，书法讲手到、眼到、心到，心到则笔到。篆刻是以刀代笔，不仅点画要精到优美，还要有神态，写得灵动。形神合一是书法艺术的精髓之一。

詹进喜的书法追求美，对于结构的变化打破了平正、稳定，从而产生动态美。

如何学习古人对书法表现的美？只有认真刻苦。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工匠精神，看到他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追求书法艺术的美。



杜甫诗《客至》　詹进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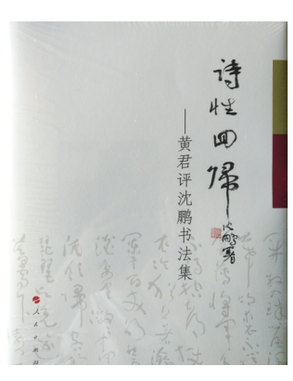
书坛传真

黄君评沈鹏、谢云书法集出版座谈会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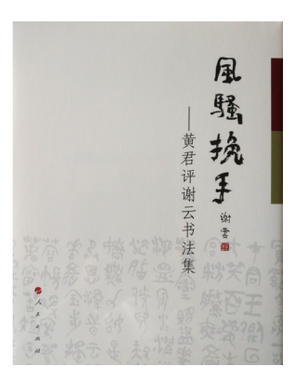
本报讯　日前，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诗性回归——黄君评沈鹏书法集》《风骚挽手——黄君评谢云书法集》出版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谢云以《追寻梦想，放飞激情》为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的人生走过了八十有九岁了，用脚步丈量了每一寸，皱纹记录了每一步。躺在故纸堆，诗书将我笔墨之间的澎湃、轰鸣、起伏、幽咽，日日用诗人的良知，去打捞书法的良知，把我拉回公元前的殷商先民狩猎、祭祀、舞蹈、农耕诸事物，享受汉字形义的美。”

沈鹏认为，黄君对他与谢云书法的推荐，其意义是用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当代书法、诗词艺术的见解。如果说当代艺术处于高原的话，那么这个高原也是相对的。沈鹏强调，当代书法需要整体进步，尤其需要创造意识，书法艺术要反对浅薄、平庸与低俗，要追求高雅境界。“高雅是艺术本身应有的素质，书法本身需要高雅，高雅并不违背大众的需要，大众需要高雅，在高雅当中提高大家。”他说。　（勉之）



《诗性回归——黄君评沈鹏书法集》



《风骚挽手——黄君评谢云书法集》